

中原时评

■ 个论

“剥夺父母监护权”需摸稳石头再过河

近日,记者获悉,民政部等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。中国现行法律中,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,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。最高法表示,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,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。(1月21日《新京报》)

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没有做好必要的监护责任,这事情时有发生。如贵州毕节5名流浪男童躲垃圾箱内避寒闷死;如南京2名女童饿死家中,尸体腐烂后才被发现;如贵州男子虐待亲生女儿5年,开水烫头鱼线缝嘴……现实案例让人不忍多看。因为多看一眼就会多一分心理绞痛。都说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,为何仍有极端的个案,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如此不闻不问、如此狠心?因极端案例并非孤立地存在,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,便显得刻不容缓。

就现实而言,仍然是制度漏洞一箩筐。我国的法律中虽然有“剥夺父母监护权”的规定,但现实的执行效果却不甚理想,何也?只因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在我国的情况是——只要父母不放弃,就没有人能够剥夺。与此同时,社会救助也无能为力——只要孩子的父母还健康,社会福利机构原则上就不会收养。当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均有“现实瓶颈”,未成年人被监护人伤害的事情偶有发生便不难理解了。

如今最高法表示,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,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,用通俗的说法就是“剥夺孩子父母监护权”,这样的举措,让人看得见希望,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而且,按照发达国家

的一般标准,公权机构会设置一条法律底线,当父母的行为突破了这条底线,公权力便会立即介入,强行剥夺他们的监护权,并给孩子提供一个领养家庭或者是其他福利机构的生活环境。我们当前的制度出发点,与这几乎一致,让最无助者享受到足以保障健康成长的社会福利,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最高体现。

不过,因“剥夺孩子父母监护权”兹事体大,牵一发而动全身,要摸稳石头再过河。一者,需先完善监护人制度,依照《民法通则》提出的标准,在父母之后,监护权的顺序是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兄、姐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,但如果没有亲属站出来,政府也应有兜底制度,确保为孩子找到一个温馨的“收养家庭”。二者,对收养家庭的后期跟踪调查必须有,毕竟,孩子找到一个“新家”,这个家对孩子怎样,会否充满关爱,需要后续跟进。三者,社会救济制度仍不能停滞,如按《民法通则》的顺序,是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成为孩子监护人的话,因年龄、照顾能力等问题,此时社会救济必然不可或缺。此外,假若是最坏的结局——孩子无人收养,那社会救济更加不能缺失。

毕竟,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不是目的,只是手段,为孩子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才是终极目标。这显然是责任重大的事情,不可盲目,应谋定而后动。“孩子父母被剥夺监护权”之后的一系列问题,必须有配套的制度设置。如此才能出台“孩子父母被剥夺监护权”的法律条文,不然对孩子来说未必是一种保护,也可能是“二次伤害”。

□龙敏飞

■ 个论

压缩三公经费应脱离“指标控”

截至目前,已有28个省市区的两会陆续召开。从各地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,大多数省份的报告都提及了三公经费情况,并表态要过紧日子,严控三公经费支出,其中多个省份明确提出了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压缩比例。压缩比例最高的为浙江省,达30%;江苏、宁夏、青海等均提出要压缩5%。(1月21日人民网)

在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社会新风中,各地提出压缩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比例指标,尤其是有的省份压缩比例超过10%,甚至达30%,呈现出了一组令人欣慰的数字。不过,应该注意的是,在各种规章制度并不健全的阶段,指标控制是最简便易行的手段;在政府部门行为被“关进制度的笼子”过程中,单靠“指标控”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,其科学性就值得商榷。

2013年各地三公经费支出普遍出现较大幅度缩减,譬如福建削减了13.5%,甘肃下降了20%以上,海南文昌市降幅为13.7%,武汉市同比下降16.5%……全国人

大代表叶青就此指出:这与2012年底中央提出的“八项规定”有关。“八项规定”从遏制公款消费、控制出国等源头约束了三公消费,使得各地政府部门三公支出缩减。

如果条分缕析地审视各地三公经费支出的下降,公务接待费用瘦身和因公出国(境)费用压缩贡献了相当的比例。譬如海南文昌市三公经费支出总体下降了13.7%,其中公务接待费和因公出国(境)分别下降33.5%和54.1%。也就是说,在三公经费缩减中,占三公经费60%以上、金额最高最难管的公车经费压缩,并没有做出绝对贡献。

事实上,在“八项规定”之后,中央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,其中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,对经费管理、国内差旅和因公出国(境)、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、会议活动、办公用房、资源节约等均做了明确规范和规制。关于公务用车,要求“坚持社会化、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”。正如叶青的观察:在现在的基础上,三公经费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缩空间,其中之一就是公车改革问题。

以此来看,各地提出的今年三公经费支出压缩指标,是多还是少呢?这显然很难判断。事实上,各地公车改革尚未大面积铺开,如果这项改革在今年拉开大幕,那么各地三公经费支出缩减远超过5%,是轻而易举的事;如果仅仅从公务接待、因公出国(境)、节庆论坛会展等方面压缩三公经费5%,也不是没有可能,却在推动公车改革方面有失诚意和动力。

只有政府部门的行为完全纳入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、《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等制度的笼子后,明确缩减比例才具有不凡的意义。也就是说,缩减三公经费需要以改革进度和指标双控,单靠“指标控”可能会遮蔽改革的紧迫性和延迟改革的进度。□燕农

■ 街谈

“七不准”缘何打不死“内部黄牛党”

针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关于“黄牛”称有铁路内部人员参与倒票的报道,记者采访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。该负责人强调,铁路部门对铁路内部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纪律要求,并已向社会公布了“七不准”的售票纪律和有奖举报的措施。一旦发现内部人员参与倒票,一律严肃查处,绝不姑息,并向社会公布查处情况。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旅客监督举报,一经查实,将给予举报人重奖。(1月21日中国广播网)

虽然中国铁路总公司已经公布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,宣称举报有奖,将对“内部黄牛党”进行严打,但纵观一部“春运史”,“内部黄牛党”俨然已经成为春运的一个重要角色。不论是类似“七不准”式的条例治理还是火车票实名制,乃至网络订票,都难以刹住这些“带头大哥”的凶猛。当然,这也不意味着这些措施完全无效。与往年相比,黄牛党的活跃程度已经锐减,只不过所谓的“内部黄牛党”仍没有束手待毙。因为,从本质上来说,内部黄牛党所牵涉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恶性刷票,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权力寻租问题。这听起来固然有些老生常谈,但也确实是铁路行业存在的一个恶性顽疾:虽然人人皆知,却难以根除。

如何治理“内部黄牛党”,关键还要靠铁企的市场化改革。在未有改革之前,铁路运输主要由铁道部负责。而铁道部政企不分被诟病由来已久,铁路运输则还保留了某些计划经济色彩。当外部的大环境已经演变为市场经济,铁路行业所存在的这种计划经济空间,就可能蜕变为一种

权力寻租的空间。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双轨并行的经济制度,权力之手是有可能通过插手具体的经济事务在两者之间辗转腾挪“为我所用”。

现在,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行,铁道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它所留下来的坏毛病短期内恐很难一并扫除。新成立的“铁企”,在票务服务等方面,虽较从前有较大进步,但在制度监管等方面,仍与现代化企业有较大的差距。旧有机制的顽疾,在一定程度上被“铁企”所沿袭。所谓“内部黄牛党”不过是其继承的“遗产”之一。

更重要的是,就市场地位而言,“铁企”在铁路运输上仍一家独大。当民众不满意它的服务,也无法用脚投票来实现倒逼。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黄牛党又恨又爱的缘故:恨它是由于它的票价太高,爱它则是由于好歹还能买上票。但由于铁路系统的特殊性,一条铁路线路的服务无法拆分给不同的公司运营,从而也就不可能如航空公司一样实行多元管理。不过,从制度管理的角度审视,这种问题其实亦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。加强“铁企”的制度性建设,在员工之间引入竞争与淘汰机制,以科学的量化管理方案,将铁企员工、铁企领导的工作情况与相关待遇晋级、淘汰挂钩,使铁企成为真正的企业,让员工真正对乘客负责、对公司负责、对企业利益负责,从而压缩“内部黄牛党”的利益空间,推动火车票务信息朝着彻底透明化的方向迈进。

□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

■ 街谈

“中国式逼婚”的代际差异和焦虑心态

近日,一份《2013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》显示,近六成受访者曾被父母“逼婚”,“80后”是遭遇父母逼婚的主要群体。超四成的父母选择“唐僧模式”,即不断地言语催促;近两成的父母喜欢“发动群众”,用亲朋群体施压;还有的父母直接赶鸭上架,强行安排相亲约会。(1月2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一提到父母,许多人都会联想到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。从情感上看,“父母心”体现了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;从道德上讲,“父母心”处于一种特定的道德压力之下。在中国特有的人格建构模式中,子女只要没有成家立业就始终不算成人,父母有权利也有义务管教和督促。当传统的婚恋文化和现代的焦虑心态相结合,“中国式逼婚”的火焰便越烧越旺。

父母与子女在生活经历、教育背景、价值观念上存在着鲜明的代沟,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。然而,在子女婚恋这个问题上,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、融合在一起。子女觉得父母太过市侩和现实,父母则认为子女太强调感觉和缘分,生活方式的代际差异,择偶标准和婚恋观念的摩擦与碰撞,导致“中国式逼婚”愈演愈烈。

为什么明知婚事要由子女决定,父母却不厌其烦地催婚乃至逼婚?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也好,基于预防的未雨绸缪也罢,当松弛的情感关系

与焦虑的社会心态交织在一起,张爱玲那句“出名要趁早”,变成父母们“结婚要趁早”的忠告。焦虑的父母们,以爱之名,不断鞭策子女在择偶的道路上绝尘狂奔。

当“中国式催婚”成为一种结构性压力,不堪重负的子女被动地选择“破解之道”。不论是闺蜜扮“恋人”宽慰父母心,还是躲“逼婚”干脆不回家,抑或是租赁男女朋友回家,春节原本是合家团圆的美好时刻,却嬗变为子女与父母钩心斗角的舞台,这样的无奈和艰辛,让人唏嘘不已。

事实上,“中国式逼婚”更是当下青年人婚恋困境的缩影。每一个“剩男剩女”的背后,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考量和情感纠葛。当择偶偏好与经济条件、社会关系、教育背景等社会资本勾连在一起,“门当户对”的阶层内婚姻也好,“女性往上找,男性往下找”的梯度效应也罢,年轻人并不是不愿意成家立业,而是现实的窘迫与无力,让他们缺乏“想爱就爱”的自信与从容。

子女们固然要摒弃好高骛远的婚恋观,父母们也要尊重子女婚恋的独立自主权利,对子女的生存境遇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。当然,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,应该让青年人拥有更多“人生出彩,梦想成真”的机会。只有多方合力,“中国式逼婚”才会逐渐消减。□杨朝清

华泰财险车险电销统一呼出号码调整公告

本公司车险电销职场设立在上海,因公司资源整合需要,自2014年1月27日起将本公司车险电销全国统一呼出销售号码由021-95509调整为4006-012345。统一呼入号码仍为4006-012345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
2014年1月22日